

中文工具书参考资料选辑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

一九八三年

编 辑 说 明

《中文工具书》是我系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为配合此课的教学，特编辑本资料选辑。

学习《中文工具书》，目的是为了运用工具书解决读书治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通过工具书来检索资料。为达此目的，既要系统地掌握工具书，又要知晓问题、资料的检索途径和方法，因此，此课的参考资料应包括这二方面。

由于近年来出版的工具书使用法，一般以查找问题为纲，阐述工具书的使用，它们对检索的途径和方法已有概略的说明，故本资料集仅选录有关中文工具书（包括有关的知识）的资料。

资料依课程章节内容为次，择要选录，并以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新资料为主。

我系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图书馆馆长进修班，进修班开设《参考工作与工具书》一课，为满足此课的教学需要，增选了一组有关参考咨询的资料，作附录列入。

限于水平与篇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本资料选辑由任课教师卢中岳选编。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略论工具书	来新夏 (1)
汉字查字法的回顾	孙公望 (19)
论词典的类型	王德春 (29)
略论近三十年来中国语文词典编纂法的发展	周祖谟 (45)
辞书源流初探	郭文瑞 (52)
《说文解字》概述	钱剑夫 (133)
《尔雅》与百科全书	蔡声镛 (154)
《广韵》和《广韵疏证》	赵少咸 (174)
纂集派训诂著作《经籍纂诂》	汪耀楠 (186)
《方言》及注本	黄典诚 (196)
我国古代的虚字辞典	钱剑夫 (208)
论《康熙字典》	张洙华 (225)
谈谈《辞通》	金文明等 (275)
《辞源》与《辞海》	赵克勤 (289)
《中文大辞典》的优点和问题	陈增杰 (296)
类书的文献价值	洪湛侯 (311)
《艺文类聚》概说	潘树广 (326)
《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	王重民 (340)
《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和作用	胡道静 (355)

陈元龙的《格致境原》	钱玉林 (372)
杜佑和《通典》	陶忞炳 (380)
百科全书概论	常 政 (402)

中国古代的历法	王 力 (418)
谈谈古代用干支纪年月日的问题	吴浩坤 (434)
陈垣同志编著的年代历法工具书	刘乃和 (443)
天历与检查天历的工具书	查启森 (455)
评《中外历史年表》	杜汉鼎 (461)
简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	汤志钧 (477)
中国年谱概说	杨殿珣 (480)

论《四库全书总目》	王重民 (506)
《续修四库提要》纂修考略	郭永芳 (540)
试评《中国丛书综录》	俞海兰 (557)
方志遗产的目录学总结	胡道静 (565)
《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	王重民 (572)
国家书目与呈缴本制度	刘启柏 (585)
谈谈评介中文工具书的文献资料	王恩保 (602)

附录:

参考咨询工作初探	孔令乾 (615)
咨询工作分析	赵世良 (626)
浅析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	徐树文 (640)
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坠露添流——浅谈我馆社科参考工 作	邢淑贤 (649)

略论工具书

来新夏

(一)

工具书，顾名思义是指作为我们读书工具的一类图书。它在读书和治学中可以发挥一种辅助作用。

古代，图书数量不多，一般学者能够以皓首穷经的功力去博闻强记。因此，工具书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问领域日益广阔，图书文献日益增多，单凭背诵记忆已经势所难能。诗人墨客既不能将字的韵部都记住，同时也需要检索大量的优美辞藻来启发思路和雕饰文句；某些统治者由于难以博览群籍而命人把相同内容的文献记载依类偏次为类书供省览；而治学者尤其需要迅速准确地解决文献中的许多问题。于是，工具书的制作便随之而兴起和发展。

工具书的制作，究竟始于何时？

郭沫若氏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曾举出一个骨片上连刻了一月、二月各三十日的干支和少数其他文字，认为这“是当时的宪书之类。”有人就据此认为“这就是我国工具书的滥觞。”（王世如：《报刊索引和报刊索引工作》，油印本）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骨片纪日只是当时人的计

算日子的纪事，对后人查对是起了工具的作用，还不能算有意识地制作工具书。工具书的正式制作是否可以公元一百年时写成的《说文解字》和约在公元二二〇年至二二六年间辑成的《皇览》等为最早。不过，那时除了字书可能由于所谓“正名”的关系列于经部小学类之末外，其它都不被视为著述，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如在魏文帝命令下所编的类书《皇览》也只不过被视为钞纂之学而已。这种漠视态度对后世的学者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象清代汪辉祖那样倾毕生精力于工具书制作的学者，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即使有些朝代曾编纂一些类书，发挥了工具书的作用，但那是有另外一些动机和目的（如宋初为了安置降臣旧臣等），并非真正了解工具书的意义和作用而组织制作的。这就不能不使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发出了“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的感慨（《中西回史日历》序）。其能比较明确而恰当地论及工具书制作问题的，当推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他在论校讎问题时曾说：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讎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讎之良法欤？”（《校讎通义》内篇一《校讎条理第七》）

这段话虽是对便于校讎而言，但它对工具书的制作，内

容、地位、利用的效果等方面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自清以来，至于近世，工具书的制作日多，同时也逐渐引起重视，许多有成就的学者都亲自动手制作有裨实用的工具书，并取得了成就，如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汪辉祖的《史姓韵编》等和李兆洛的《纪元编》等，都给学者创造了极大的便利。近代学者陈垣先生用力尤勤，贡献尤大，所撰《中西回史日历》允为工具书中的空前鉅构。

工具书既渐为学者所重视和利用，则其于读书、治学的效果自不待言。这里可以例举数端来略作说明。

工具书可使人由不知而渐趋于知：学者博涉群籍，如遇到人不详其生平，地不明其方位，字不识其音义，典制不晓其沿革，名物不察其形态时，便自然成为一种障碍。设能检阅相关的工具书，按图索驷，豁然得解，那么不仅解决当时的疑难，而且也使原先所不知者一跃而为知者，其成效正为章学诚所说：“可坐收于几席之间。”

工具书可以丰富和补充知识。学者知识，终难该备，或此全而彼缺，或知一而略二。如魏人李悝，一般都知道悝音恢，是人名。但是在字书中，悝尚通恢，作嘲笑解，那么张衡《东京赋》中的“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奏穆公于宫室”之句所以得解；另外悝又可读里声，作忧愁解。这样便由知一字而得三义。又如仅知一人名字，而当借助于碑传文通检之类的工具书而索得传记后，便能较详细地了解此人生平，所以说，工具书能起拾遗补缺、丰富知识的作用。

工具书能够避免或纠正不显著的错误：明显的错误易于避免或纠正，而隐晦的差错往往易于忽略，难于发现。如中西历换算问题，中历当年岁暮往往是西历次年岁首，若单从

年来换算，有时会有一岁差异。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卒于宋光宗绍熙三年，按年对换是西历一一九二年。看来无长差错，但事实上西历已差一年，因为陆的卒日是十二月十四日，利用中西历对照换算的工具书仔细核换应是西历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所以陆九渊的卒年应是公元一一九三年。这样就使一些不明显的差错得到避免或纠正，而达到精确无讹的程度。

工具书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启发治学门径。我国图书为数浩繁，前人成果也不在少数，若各种问题都从头作起，在烟海中漫加摸索，则旷日费时甚为不利；要从群籍中去搜检散处资料，也难有成效。如清代学者著作中散存各种有关问题的论述，若一一翻检爬梳，实力有所不及，如置而不论，又感到大有缺漏。王重民先生编《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曾集清人文集四四〇种，分类排列篇目，这就使学者至少省去四百余种文集的翻检之劳。正所谓一编在握，事半功倍，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而在使用工具书的过程中又可逐步领会某些问题应向那些方面去探索的门径。

总之，工具书对于读书和治学确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人们学力不同，对它的感受也不一，要在使用者的亲自体验与领会。

(二)

我国的工具书，肇端极早，历代多有制作，清代尤盛，最大要类述如次：

一、类书：这是我国古代的工具书形式。有人称它为

国的百科全书，从内容和编纂体例看，此说不够准确，它是把各种图书中的有关资料，或按问题分类，或按字分韵，加以汇集而成的一种资料类编，是便于省览、记忆和检索的一种工具书。

类书在唐以前的目录书中没有应得的地位，如《隋志》的内容庞杂而放入子部杂家类；《旧唐志》虽有类事类，也还不具类书之名，直至《新唐志》始有类书类。

关于纂辑类书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类书类，立梁元帝（公元五五二年——五五四年）撰《同姓名录》三卷于首，认为“类书之起，当在是时。”《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承此说。

其二：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篇，认为“类事之书，始于《皇览》。”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皇览》是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中（公元二二〇年——二二六年）命散骑侍郎刘劭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其书久佚。清人有辑佚一卷。清张之洞《书目答问》承此说。

《皇览》的撰成早于《同姓名录》三百余年，自应以《皇览》为类书之始。

类书可以帮助学者找到同类相关的若干资料。有些资料来源本身已佚，赖类书以存，则更有参考价值。《四库提要》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论说：“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当然，这些资料是否是原貌，则尚需经考订后方能确定，而且辗转沿袭，往往谬误传递，所以，近人刘文典在《三余札记》卷一中特著其事说：

“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持。……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如宋之《太平御览》实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参详条次，修纂而成。其引用书名，特因前代类书之旧，非宋初尚有其书，陈振孙言之详矣。若《四民月令》一书，唐人避唐太宗讳，改民为人，御览乃竟仍而不改。书名如此，引文可知。”

类书也可以帮助检索典故或文辞的来源。如果所引原书尚传世，最好再核对原文，以求确切。

类书篇幅，一般较大。宋代的《太平御览》是现存的有典型性的一部类书，它以问题类别编次，共达千卷。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卷帙巨大，内容丰富，颇资考订。另外为《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虽然它是供作诗叶韵、搜求词藻之用的韵书，但因书中包括许多典故资料，并注有出处，因而也具有类书的性质和作用。《佩文韵府》是以尾字四声分韵编列，收二、三、四字的词语。《骈字类编》是以首字与字头一致，专收二字合成的词。它们在内容和编制上虽存在一定的缺点，但可用来检索典故、词语的来源出处。至于韵编问题，如果不太熟悉，则可先查辞书，检得韵部，再按韵求词。新印《佩文韵府》附有检字，则更为方便。

二、字典：旧称字书。识字是解决读书困难的先务。所谓“读书必先识字，字且不识，遑论其他。”字书可以解决字的读音、训义、形体结构和用法等问题。

我国古代字与辞的工具书不严加区别，统称字书。它的来源甚早，《汉书·艺文志》便有周宣王太史所作《史籀》十五篇和其他著述共十家四十五篇的著录。现在完整存留而系统分明的字典是东汉和帝时许慎所编的《说文解字》。以后各代

都有所作。目前常用的是《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

清人研读古书的风气甚盛，为了解决古书中的疑难处字，遂纂辑虚字字典。刘淇的《助字辨略》收字四七六个，创此类书之始。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虽仅收一六〇个字，然能补前所未及，正前所谬误，并略去易晓者，所以颇为简要精审，历来极受推重。近人杨树达的《词诠》，内容较广，使用也便，对初学者极为有用。

三、词典：一称辞书。大都兼收字和词。有些注明出处。可供因辞求解，按迹求书之用。我国最早的词书当推《尔雅》。目前通用的是《辞源》和《辞海》。它们都以部首编次，是综合古代字书、韵书、类书及近代词书于一编的工具书，翻检使用都较方便。近年对二书都重加修订，《辞海》分订全三册和分类分册两种，已出版问世，《辞源》四册也相继印行。

另有专门性质的辞书，备检索普通辞书范围所不及者，如专检人名的有《中国人名大辞典》，收人达四万之多，可以借知人物简历，但记录出处生卒不详不备，只能作普通参考，不能供较详了解之需。专检地名的有《中国地名大辞典》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后者系在前者基础之上编撰的，所以略有增益，但其大弊，在于所谓今释早已过时，只能借以略知方位而已。其检专门地名的有《西域地名》是目前专检古代西域地名的一部工具书。它以罗马字按英文拼法排列。书后有汉名笔划索引。它虽仅收一千四百余地名，然重要者已大体网罗。其专检特殊方言、俗谚的词典为张相的《诗辞曲语词汇释》，集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语词，详引例证，解释其意义与用法，于读书颇有裨益。清人翟灏编《通俗编》，采集方言俗语共五千余条，按内容性质分类，诸词都找出根

据，引书证释。钱大昕的《恒言录》，性质相同，而纂辑较翟编为精。

四、索引：旧称通检或备检。索引一词则据日文よんいん语译音而来。另据英文 index（指点）之音译成引得。这是专为检索来源的一种工具书，如书籍内容、辞语或引文来源均可利用这一工具。

我国制作索引，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清代汪辉祖编著的《史姓韵编》一类的书已“具有索引性质”。（涂宗涛：《常用文史工具书简目》）也有人认为在《史姓韵编》前一百四十多年的傅山所编《两汉书姓名韵》是创始之作，因而把我国索引出现的时间“定为十七世纪上半叶比较更为合适”。（王世如：《报刊索引和报刊索引工作》油印本）我则认为，索引的创制，当推宋代的《群书备检》。据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卷九称：

“群书备检十卷。右未详撰人。辑易、书、诗、左氏、公羊、谷梁、三礼、论语、孟子、荀子、扬子、文中子、史记、两汉、三国志、晋、宋、齐、梁、陈、后周、北齐、隋、新旧唐、五代史书，以备检阅。”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八也说：

“群书备检三卷，不知姓氏，皆经史子集目录。”

《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说：“其书已亡。”明《文渊阁书目》卷十一著录“群书备检一部，三册、残缺。”是明尚有残本。从这些记载看来，此书当系经史子集的篇目索引。

索引用途颇广，形式也多样，按其编制内容来看，大致有：

（1）书籍内容和文句的索引：这类索引常作为一书附录，

供检索书籍内容之用，西书中使用比较普遍。我国过去往往别行。如清黎永椿的《说文通检》便是用来检索说文部首及各字的工具书。近人叶绍钧的《十三经索引》便是检索十三经经文来源出处的工具书。其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制作的各种古籍内容引得也有同样作用。解放后重印的多种工具书，书后多增附索引，极便使用。

(2) 书籍、论文的篇目索引：如王重民的《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是清人四四〇种文集篇目的指南。其散见报刊、杂志的篇目也多编有索引，如《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等就对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3) 专题索引：这是就专门一类问题编制的索引，如《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系检索正史中人名部分的索引；如《室名别号索引》则可通过室名别号而引致本名；而陈乃乾的《清朝碑传文通检》不仅人物的姓字、籍贯、生卒可一索而得，尚能指引碑传文的出处，追求本源。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宋元明清各代传记引得分册也极有用。这四册索引合用则自九六〇年至一九一一年将近千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均可从中获致线索。

五、表：这是检索人物、大事、年代等简明情况的工具书。表有悠久的传统，最早称谱，所谓“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通志·总序》）司马迁《史记》改而称表，有世表、年表和月表之分。班固《汉书》有《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之作。后世也继有所作。宋郑樵《通志》又改称为谱。清代制表风气甚盛，而补各史阙表之举更为突出，如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汪白桢的《十六国纪年表》、周嘉猷的《南北史表》。……开明《二十五史补编》搜罗较多。

这些表中以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最为学者所推重。朱彝尊在书序中说此表“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置百世于方册之间。”黄宗羲更称此为“诚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者也。”这些评论说明表在工具书中的地位。的确，一部制作精善的表就能起到条分类繁、有条不紊，旁行斜上，一目瞭然的作用。如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就是检中西回史日历、曜日的良制，为治学者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之一。最近，纪大椿同志在前人基础上，参考多籍，编制《1821—1950年中西回俄历表》（新疆人民出版社印行），不仅增入俄历对照，又标识曜日，对近代历史中各历的换算，极为有用。

六、图谱：这是具体地、形象地理解和认识地理方位与文物图象的一种工具书。我国历来都给予应有的重视。《汉书艺文志》对于图谱都在附注中特加著录。宋代学者郑樵对于图谱特别强调，他说：“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并撰著了《图谱略》，成为《通志》二十略之一。

一般说来，我们常用的图谱有两类：

一类是指明地域方位的地图，为查找当前情况，一般常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和《世界地图集》。但对治学研究来说，历史沿革地图更为需要。近人杨守敬所制《历代舆地沿革图》，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创制，可惜篇幅过大，使用不便。解放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集中专才，搜集资料，参证研讨，罄多年功力，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巨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反映了1840年以前我国各历史时期的政区设置和部族分布的基本概貌，但也以篇幅巨大，造价过昂，不是私人 and 一般图书馆所能设备，流通较少，未

能充分发挥作用。若能缩印或刊行普及本，使图集得到更广泛流传，则造福学者匪浅。目前人们比较经常使用的是顾颉刚等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共收图四十七幅。自原始文化遗址分布图起至鸦片战争前清帝国图止，凡政区划分，人民起义、交通路线、四邻形势均有涉及，并另有附注说明及地名索引，虽尚有需加修订处，但仍不失为一般参阅使用的工具书。

另一类是文物图谱，如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图谱》，内容比较丰富，是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郭若愚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正补编，可以从中看到太平天国革命文物的形象。《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和《青铜器集释》，《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和《陕西江苏热河安徽山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等都是古器物的重要参考图录。

七、目录：这是寻求书籍和初步了解书的时代、著者、性质和内容等方面的工具书。它有国家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地方目录、专门目录等多种。它从《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都有不少目录著作，一般常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贩书偶记》和《书目答问》。

此外，正史的志书、历代会要、学者的读书记和十通等，虽然不是工具书的形式，但根据学者读书治学的需要，也往往起到工具书的作用。年鉴和百科全书也都是重要的工具书，但对中国史籍和一般学者来说，使用略少，所以就不再多加述及。

(三)

使用工具书，主要是为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一、人物：人物是文献中的重要成分之一。一切活动总要牵涉到人物。许多人物的情况，不易全面了解和记忆，有些不经常见的人物，甚至连简况都难知，这样，对于读懂和掌握文献，便有困难。加以古人行文往往有使用异名的，更会造成一定的窒碍。这些就需要借助于工具书来解决。

如果只需要知道人物的字号，生卒、里贯等简况，那么使用《中国大名大辞典》、《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和《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之类的工具书即可。

如果需要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就可以使用碑传文通检和传记引得之类的工具书。

如果要了解检索人物是否见于正史，那么运用《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就可以知道是否有传，还是只在某一传中提到，进而检读传文可以对人物有更多的了解。

如果在文献中或书画题款及印章中遇到人物的别名，有些尽人皆知的如亭林、黎洲等尚无妨碍，若是一些生僻的别号如止止居士、西溪渔者等便无从了解，但利用《室名别号索引》即可检知前者为潘耒，后者是厉鹗。又如有的文章之末只署室名而略其本名者也可借助同书来解决。《室名别号索引》一书按笔划多寡排列，故检索甚便。

二、地理：地理区划、方位、沿革和今释也是文献资料常遇到而需解决的问题。对于各朝的行政区划可利用正史的地理志和清代学者所撰的有关补志。对于地名今释，清人李

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虽时代已不合，但尚可参用来辗转以求，《中国历史地图集》后所附的《地名索引》也注有今地名，不过有些地名由于行政区划变更频繁而不断变更归属，这就需要随时注意国家公布的变更消息。如果再比照最新地图的方位，那就更易于了解。对于方位沿革则可借助于地名辞典、有关地方志和地图。有些类书中也汇集了一些历史地理的资料，如《太平御览》卷六十的地部。近年来编制的关于专题资料的工具书是地理工具书的新发展，如广东中山图书馆所编《东西沙群岛资料目录》从中外文图书、报刊、地图、档案、抄件、影本等进行了广泛地搜集，对学术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在地名问题上，过去的文人学者，由于好炫奇夸胜，在著述中自署或称别人籍贯时，常好用异名雅称，如以茂苑称苏州、嚈城称嘉定、余暨称萧山、云中称大同。这往往很费翻检之劳。清人管斯骏所撰《府州厅县异名录》是可利用的工具书，可惜这本小书未引起重视。

三、年代：年代是文献资料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年代更有自己的特色，即年号和干支纪日的问题，另外中西历换算问题也需要依靠精密对照的工具书不可。清人李兆洛、六承如所编《历代纪元编》，虽为清人所编，但尚可用。书分三卷：上卷列汉以下各朝年号，对农民起义、割据政权及外国年号均采入；中卷为纪元甲子表，自汉武建元元年起至清同治十年止，分年排列，凡并存政权，分格列入，建元以前另为补编；下卷为年号韵编。近人荣孟源所编《中国历史纪年》又有充实完善，更便利用。但却不能解决月、日换算问题。最得实用的是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